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TONGSHI
MINGUO ZHENGZHI

K295.1
X68a5

上海通史

熊月之 / 主 编

第 7 卷

民国政治

本卷主编 杨国强 张培德

张培德 王仰清 廖大伟 著

上海
人民
出版
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第一章 “国基未固，百制抢攘”

从沪军都督府的建立到“二次革命”失败，时间虽短，却是民国初年政治突变时期。在这个摸索和过渡阶段，在一片“共和”声中，各派势力都竭力崭露头角，于是政争不断，高潮迭起。

一 沪军都督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如狂飙漫卷，各地响应。11月3日，上海义师继起，旋于次日光复。

上海光复，意义非凡。作为中国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中外闻名的通商巨埠，上海光复的影响远远超出地域的界度。一方面，它及时地减轻了起义各省尤其是首义之区武昌、汉阳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引起江、浙两省的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正因如此，在华列强对清廷愈加失去信心。当时英国银行团驻北京代表在致伦敦的报告中写道：“上海倒向革命一边产生了很大的精神影响。南京将随之而起，这里的华人认为这是意料中的必然的结局，这样一来，大清帝国在江南不再有丝毫权力了。”^[1]《泰晤士报》更是迅捷而明确地断言：“清政府在东南之命运已绝。”^[2]事后，

孙中山对上海起义曾予以高度评价：

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3]

沪军都督府是上海光复后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从1911年11月6日成立，到次年7月31日正式撤销，历时近9个月。

人 选 酝 酿

上海起义之前，同盟会中部总会在谋划起义的同时，就已开始酝酿新政府的人选。据同盟会会员张承樵回忆：11月1日，他来到同盟会秘密活动机关的民立报馆（时为法租界三茅阁桥54号），“上楼梯将及其半，刘伯泉、周锡三告余曰：‘上海决定可以动得手了，伍廷芳已允出来担任办理外交。’不一刻，于（右任）先生来，问其确否，于先生亦然其说”^[4]。上海起义的前一天，同盟会中部总会实际负责人陈其美也曾对人讲过：“今得伍秩老及平书先生偕来，同舟共济，大事可成矣。”^[5]

中部总会不仅对有关人选早有考虑，而且还预先作了任命。据李平书自叙：起义当天，“十三日（公历11月3日）清晨，陈君以军政府照会致余，劝任民政总长，又浼余劝驾伍秩庸先生担任外交。余往晤伍先生，初以年老辞，适温君钦甫（温宗尧）至，相与力劝，乃受照会”^[6]。另据《李平书行状》：“沈缙云于十三日晨亦受财政总长之照会。”^[7]

上海为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地区，李平书、伍廷芳、沈缙云都是这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代表人物，他们因此具有影响时局的力量。

李平书，原名安曾，后改钟珏，字平书，号瑟斋，晚号且顽，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上海起义前，身兼江南制造局提调、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上海商团公会暨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等，其执掌的上海自治公所，“实际上已成为地方性的权力总机关”，同时他还掌握着至少“已达一千余人”^[8]的商团武装。武昌起义后，李平书开始倾向革命，并参与上海起义的筹划。

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生于新加坡，曾留学英国。清末多次出使海外，历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交部右侍郎等，是公认的富有经验的外交家。辛亥革命时适寓居沪上，赞成共和，而上海为通商巨埠，华洋杂处，“外交重任，尤关全局”^[9]。事隔多年之后，李平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特别指出：“此一著实为紧要关头，当日若非伍先生出任外交，各领事未必承认。”^[10]

沈缦云，原名张祥飞（或翔飞），江苏无锡人，因人赘上海沈家，遂改为沈懋昭，字缦云。上海起义前为信成银行经理、中国国民总会会长、同盟会会员，在筹集革命经费、沟通革命党人与地方绅商关系等方面贡献颇多。上海光复后，孙中山曾亲笔题赠“光复沪江之主动”匾额，“以彰其功”。^[11]

毫无疑问，由李平书等出掌新政权的民政、外交、财政，对于扩大革命声势，确保起义胜利和稳定胜利后的局面，均很有必要。李平书等人的实际地位、社会影响和政治态度，决定了他们确是新政府的合适人选。就此意义上说，预先作出任命以相邀约，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并非上海起义的唯一发动者和组织者，陈其美未与光复会商定就抢先借托军政府的名义独自作了任命，显然还包括营造氛围，以示权力所归的意思。为天下造共和的公义与一群一派之利益交杂在一起，埋下了同盟会与光复会之争的伏笔。

上海起义后，革命党人便以“军政府”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至上海光复，更以“军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上海军政分府”等名

义发表宣言、檄文和告示。尽管名目颇多,但相应的“临时性革命政权”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建立,恰恰相反,这时的上海仍处于“无政府状态,混乱非常”^[12]。组建新政府成了当务之急。“自十四(11月4日)起,各界领袖星夜谋组上海都督府,决定以小东门内清海防厅为府址。”^[13]



图 1-1 沪军都督府(原海防厅署)

都督为古已有之的一种官职，武昌起义爆发后，光复各地大多借用这一官职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立名，以督率地区性革命政府。《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凡“国民军起，立军政府”，“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14]。光复后的上海设立沪军都督和沪军都督府，正是以此为据的。当时上海为江苏省属地，非省会所在，按先例，各属地先于省会而光复的一般称军政分府，但上海处中西交汇，情形特殊，地位显著，实际上远非军政分府可比，而且取名沪军都督府而非上海军政府，也是自居于从属。都督陈其美曾明确表示：“苏省敕平后，民政各事，自以程（德全）都督统辖为宜。惟应今日之情势，驻沪各军，不能不有所统摄，故敝处专重于进取事宜。”^[15]

上海光复当天，李平书即召集地方绅商和团体代表于海防厅开会，商议新政府人选。会议推举李平书为民政总长，陈其美为军政长，吴怀玖为民政长，穆抒斋管警察，王一亭管财政，葛尚聪为审判厅长。但临近散会时，突然出现一不速之客，只见他站在会议厅当中，摸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上海与中国全局有关，武昌起义，选出鄂军都督，声望不小。陈其美昨天吃过大苦头，现在给他一个军政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应该组织都督府，要陈其美做都督。”^[16] 这名不速之客，名叫刘福标，系陈其美卫士，上海起义中曾组织洪帮弟兄充当敢死队。



图 1-2 李显谟(英石)

在置立沪军都督府的过程中,都督的人选曾是一个难题。因为这关系到最终的权力和地位,关系到各方的利益,因此,有功于上海光复的三大势力均想染指。同盟会方面竭力推举陈其美,帮会势力、报界和留日回国的士官生亦如此主张。帮会等之所以支持陈其美,很大程度上与陈的经历有关。光复会方面自然拥戴李燮和,淞沪一带反正军警也一致拥护。至于以李平书为代表的地方绅商势力,既不愿外地人陈其美来当家,也不愿关系陌生的李燮和来作主。他们中有人曾提名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钮永建(字惕生)当都督,“因为钮是上海人,但钮不愿”;有人提名上海商团临时总司令李显谟(字英石,李平书族侄,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当都督,“因为认为陈其美没有军事知识”。^[17]

宣告成立

11月6日下午2时,同盟会、地方绅商、商团、帮会、报界和部分军警代表近60人在海防厅举行正式会议,商组新政府,推举都督及有关人选。会议由李平书主持,李显谟、陈其美等各方代表均有发言。同盟会代表黄郛认为:“上海为中国第一重镇,更为革命策源地,东南最大粮台,不妨设一沪军都督以资号召镇摄。”^[18]另一同盟会代表朱少屏则竭力颂扬陈其美领导上海起义、进攻制造局等功绩。起先会场安静,但当推举都督人选时立刻发生了争执。同盟会代表及陈其美的追随者一致拥陈当都督,而商团代表、多数绅商和军警代表则认为李显谟“统率义军,英勇作战,功高任重,威信较高”,更应当选^[19]。暴躁的黄郛当众拔枪,大叫陈其美冒死闯入制造局,立了首功。商团及部分军警代表也拔枪相对,说陈其美进入制造局即遭拘禁,制造局是李显谟指挥攻下的。正当双方争执不下、剑拔弩张之际,陈其美突然宣布一

份事先拟好的名单：陈其美任都督，李燮和等为参谋。名单一经宣布，会场更加混乱，不少与会者对此强加于人的做法表示抗议。就在此时，只见刘福彪高举手榴弹，大声吆喝：“都督非陈君莫属，倘有异议，请饬吾弹！”^[20]于是，在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沪军都督府便匆匆宣告诞生。^[21]

会议的第二天，11月7日《民立报》立刻报道了这个消息：

昨日下午，本埠推举要职。众以上海为交通大埠，应另行举一沪军都督，招集大队雄军北进，以定国是，并为我东南门户之备，业已公举陈英士为沪军都督。因陈君于此事最为出力，经营惨淡，出入险地，力任劳瘁，众士归心故。又推举参谋十人，如钮君惕生、陈君汉钦，皆系知兵之士。沪人闻讯，无不额手称庆。

同一天，《申报》也作了报道：

昨天下午在城内海防厅署开大会，公议善后，当由大众公推陈英士为上海临时都督。军政概归统辖，并举李燮和、钮惕生等十人为参谋。

这一天，陈其美发布了就职通告，表示“即日视事”。^[22]



图 1-3 沪军都督陈其美

革命阵营中的裂痕

6日下午的会议,是在没有光复会会员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光复会属下的反正军警,也只有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得到通知“趋而往”^[23]。光复会上海总干事李燮和,这位都督一职的有力竞争者,不仅未获邀请,而且被褫夺原先的总司令职务,只得到一个参谋的虚衔。于是,本来协力的反清革命阵营里出现了以利权分群类的裂痕。

上海光复后,义军共同推举李燮和为“总司令”,并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名义宣布^[24]。11月5日《民立报》曾报道:“此间民军办事职员,闻已推定首领陈汉钦君、总司令李燮和君、民政长李平书君、财政长沈缙云君、军政长叶惠钧君、(洋商)交涉使虞洽卿君。办理交涉要政,公推伍秩庸担任。”次日《申报》报道:“军政府以上海为通商巨埠,亟须推举众望素孚者为办事人员,其已举出之人员汇录如下:伍廷芳为交涉总长,温宗尧为交涉部长,虞洽卿为洋商交涉长,李平书为民政长,沈缙云为财政长,王一亭为商务总长,李燮和为军政临时司令。”这些都说明了李燮和在光复上海过程中的地位是人所公认的。

但陈其美对光复会始终心存猜忌,对李燮和更是戒备不懈。据当时追随陈其美左右的章天觉回忆,上海起义前夕,陈曾“密约亲信”集议,他说:

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光复上海下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政治优势之政

党，始可无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25]

另一个同盟会会员周南陔回忆说，在联络军警准备起义的过程中，陈其美也千方百计与光复会比腕力，他曾密令周利用同乡世交关系，把已被光复会联络好的吴淞炮台台官姜国梁“拉到同盟会这边来”，“要姜完全接受同盟会的调度指挥”。陈其美说：“姜已得了光复会一笔钱，这不要紧，同盟会还可出更多的运动费。”并嘱咐“事关秘密，不可稍露风声”。陈其美周围的人则公然直言：“李燮和等不是我们的人，不可信任。……光复会专门同我们捣乱，破坏我们联络军队的工作。”^[26]

平心而论，上海起义，是同盟会中部总会与光复会上海支部共同发动和领导的。上海光复，是同盟会与光复会着眼大局，携手合作，精心策划，广泛联络和争取上海各界一同革命的结果。如果说陈其美功在争取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支持和参与革命，那么李燮和则卓有成效地策动淞沪军警反正，两者都是功不可没之人。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归国后主要在上海办报，宣传革命，并曾以上海青帮头目的身份，设立秘密机关，负责联络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

李燮和，原名柱中，湖南安化人。原华兴会会员，后加入光复会，又加入同盟会，在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来到上海，设立光复会秘密机关，并同陈其美会晤，“谋携手为后图，未及有成议”。^[27]

1904年成立的光复会，尽管不少人先后加入了同盟会，但部分会员仍保持独立活动，他们既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光复会骨干，一身兼二任。因派系观念及经费、革命策略等问题，这批人逐渐对孙中山及同盟会产生不满。1910年2月，在陶成章积极活动和章太炎的支持下，光复会又自立门户，于东京成立总部，公开与同盟会分裂。光

复会虽别树一帜,但始终坚持反清革命,在策划和发动上海起义的过程中,光复会上海支部与同盟会中部总会为了共同的目标,再次携手合作。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同盟会会员重返上海,他们一面筹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28],谋取长江流域革命;一面联络和争取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创设“中国国民总会”,作为同盟会外围组织。1911年7月底,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湖州公学(今四川北路)召开成立大会,决定“置本部于上海,置分会于各处”^[29],设秘密机关于上海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由陈其美掌管总部庶务。将总部设于上海,是因为“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同盟会中部总会自成立起便认为,若要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团结其他革命团体,表示“对于各团体,相系相维”,也希望各团体“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情感之故见,不可有也”。^[30]

此时,上海地区原主张立宪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对清廷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李平书等绅商领袖纷纷转而拥护革命,并参与筹划起义的准备。上海起义之前,沈缙云、叶惠钧、王一亭、虞洽卿等均已加入了同盟会。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态度的转变,壮大了反清革命的力量,他们所掌握的上海商团武装成了上海起义的举足轻重的力量。“辛亥上海光复,得力于商团之助者居多”。^[31]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准备上海起义的同时,光复会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1911年7月下旬,光复会的陶成章、李燮和、尹维峻等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今济南路)良善里成立光复会上海支部,以李燮和为总干事,对外称锐进学社,发行《锐进学报》,并在杨树浦及法租界喇格纳路(今崇德路)设立秘密活动机关。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燮和接受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札委,以“长江下游招讨使”的名义,积极筹划上海起义。他认为:“淞沪东南门户,而天下财源之

所委输焉，得之，则长江以南，可无血刃而定之。”^[32]但是上海一旦起义，必须得到江、浙两省的响应，“不得苏、杭响应，事终不成”^[33]。10月17日，光复会“乃议分途进取”，王文庆赴杭州，章梓赴南京，柳承烈、张通典等赴苏州，李燮和、尹锐志等则留在上海，招募敢死队，组织光复军，并竭力运动淞沪军警反正。当时吴淞、闸北一带军警的上层人物中有不少湖南人，这是李燮和联络和争取他们的有利条件。通过同乡关系，他首先联络了吴淞巡官黄汉湘，通过黄又同闸北巡逻队官陈汉钦建立了联系，再通过黄、陈，又争取驻沪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营管带王楚雄、江南制造局附近炮兵营哨官成贵富、海巡盐捕营统领朱廷燎、吴淞警务长杨承溥以及济军督队官徐彪等人。章、王等均“愿以所部为民军”，于是淞沪一带军警“皆隐附燮和”^[34]，其中陈汉钦、黄汉湘、朱廷燎三人还加入了光复会，这就为上海起义铺平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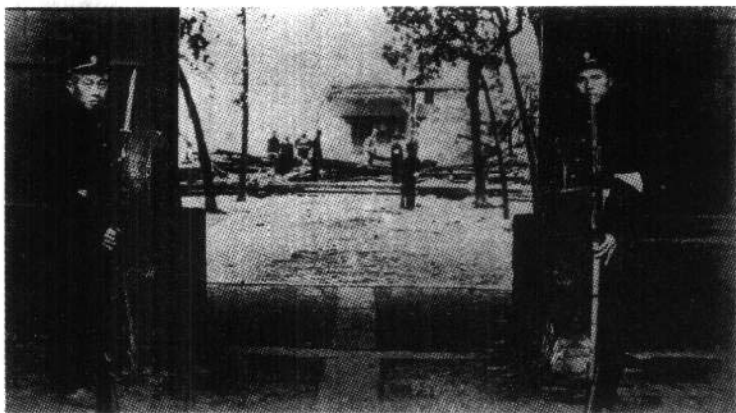


图 1-4 上海起义军占领清政府道台衙门

11月3日起义，是陈其美与李燮和共同商定的。革命党人原打算上海跟随江、浙，“视南京举动”^[35]，因为上海“人械兼乏”，“且宁、杭近在咫尺，咸驻有重兵，朝发暮至，苟鲁莽轻举，难奏肤功”^[36]，可是没料到武汉战局骤然恶化，而原计划的南京新军第九镇起义又因

泄密而搁浅。10月底11月初,宋教仁、黄兴从武汉接连来函告急:“此间战事吃紧,亟望各处响应”,“亟盼宁、皖响应,绝彼海军后援”^[37]。显然,“此时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38],因此革命党人改变原定方案,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39]。适时获悉清军5艘军舰正准备从江南制造局装运武器到汉口,如果上海再不动,“以伐其谋”,恐怕武昌也难保全。于是,11月2日,陈其美与李燮和约会于民立报馆,“议即举兵”,时间为“明日午后四时”。^[40]

11月3日上午,闸北巡警情急之中率先发难。下午,陈其美冒险闯入江南制造局,企图说服总办张士珩停止抵抗,结果反遭拘押。李燮和闻讯后急忙调集军警,会同商团及敢死队连夜进攻,于次日上午攻占这座清军的堡垒,救出陈其美,宣告上海光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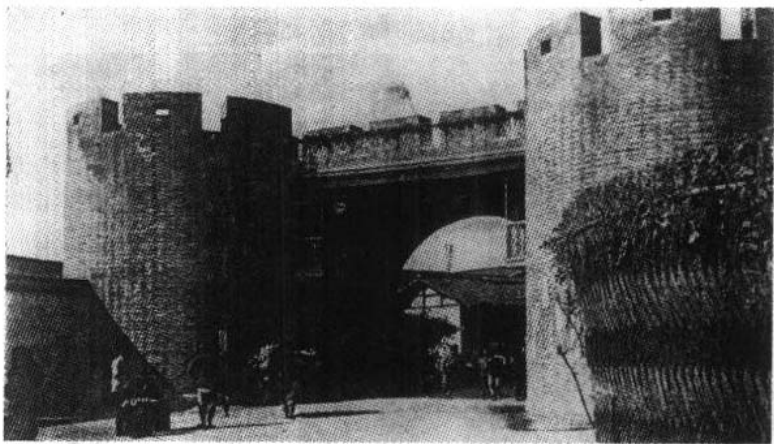


图1-5 辛亥光复后的上海制造局

因此,同盟会会员冯自由事后论上海光复之功,以陈、李并举:“担任上海光复之任务者二人:陈其美与李燮和是也。”^[41]有人甚至认为,“淞沪之克,燮和之功第一”^[42]。论实力和名望,两人各有凭借,同样难分伯仲,而黄兴在获悉上海光复后寄重的也是李燮和:“沪

事如何进取，乞卓裁主持，不必远商。”^[43]正因为李燮和有功绩和声望，因此，陈其美力争都督之际，李燮和便成了最先被排斥的人。

其实，陈其美不是没有资格当都督。一方面，陈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实际负责人，也是上海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按《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之规定^[44]，他显然符合条件。另一方面，陈当选都督，也是同盟会的要求。陈后来提出辞职，谭人凤曾严加指责：“都督一职，乃吾党起事时，法律之所规定，与虏廷督抚制不同。公既以实心任事，则不能以己意取消。”^[45]陈在复书中也写道：“吾党规定其美为沪军都督。”^[46]此外，陈长期在沪从事革命活动，在商界、报界、帮会中拥有广泛社会基础，影响很大，因他曾留学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也都倾向于他，因此，陈在竞争都督时就明显占有优势。陈其美当都督有其合理性、必然性，但问题在于他太喜欢用手段，结果造成了革命党内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激化以至分垒对立，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陈其美是矛盾的主要制造者，应负直接责任。

光复会劳苦功高，但却几乎被排除在新政权之外，李燮和、陈汉钦名列“参谋”，实际只是点缀，沪军都督府各个重要席位完全由同盟会和地方绅商势力包揽。面对这种情况，光复会方面十分愤慨，“军警界惟知有燮和”，准备起兵相争，李平书急忙晤劝李燮和：“今日之事，大局为重。”^[47]李燮和听从了劝告，同意将吴淞、闸北军权交出，陈其美则拿出钱款犒赏军警，以示安慰。

但光复会系统黄汉湘、朱廷燎等人仍然不服，便在吴淞另立军政分府，举李燮和为都督，黄汉湘为司令，朱廷燎为总参谋，杨承溥为民政长，以示与沪军都督府分庭抗礼。11月9日，李燮和去吴淞途中，遇刺客枪击，人皆怀疑系陈其美所为，于是光复会与同盟会关系更加紧张，后来竟发生了陈其美派人刺杀陶成章的惨案。“淞沪相去数十里耳，而两督并立。”李燮和觉得不妥，乃致电程德全，“请以吴淞隶江

苏都督”^[48]，去都督名号，改称总司令，将黄、朱所部及济军黎天才部改组成“光复军”，设总司令部于吴淞中国公学。11月中旬，李燮和发表声明：

本军政分府由武昌军政府分出，今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兼承认苏州军政府为江苏全省军政府，其办法如下：

(一)本分府专以筹备进攻军务为主，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

(二)本分府暂借中国公学地址为办军务之所。

(三)凡吴淞可屯驻操演军队之公所地段，均由本分府择用。^[49]

1912年1月，李燮和被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南京韬园，吴淞军政分府总司令一职由杨承溥代理。同年3月底，吴淞军政分府奉命撤销。^[50]

沪军都督府的性质

虽然陈其美好用手段，但在光复后成立的沪军都督府毕竟是一个共和政权。按《沪军都督府条例》：都督府下设司令部、参谋部、军务部。三部“均直辖于都督，受都督之指挥命令，执行主管事务”。司令部部长由都督兼任，下设秘书科、收掌科、传令科；参谋部下设筹划科、谍报科、交通科；军务部下设军事科、人事科、军械科、军需科、执法科、训练科、总务科。《条例》还规定：“各部、各科初级将校以上，均由都督亲任；各部及各营初级将校，由该长官呈请都督亲任。”“凡发布命令及赏罚，任免各部及各营文武人员，均属都督之大权。”“关于军政重要事件，由都督召集临时军事参议会决议施行。”另外，外交、民政、财政、交通、海军五部也属于都督府，但不由都督直辖，部长也

不由都督任命,“五部科目条规,归各该部另订专则”,具有一定独立性。

根据资料综合,现将沪军都督府各主要机构、人员排列如下:

沪军都督府 都督陈其美

参 谋: 李燮和、陈汉钦、钮永建、章 梓、李显谟、王熙普、
叶惠钧、黄 郛、俞凤韶、杨兆崙、沈翔云

顾 问: 虞洽卿、沈恩孚、曹雪庚、温朝诒、许葆英、许继祥、
姜国梁、梁敦焯

司令部: 部长陈其美、副长盛典型

秘书科 科长汤振常

收掌科 科长应兆松

传令科 科长姚 霁

参谋部: 部长黄郛、副长刘基炎

筹划科 科长杨典钦

谍报科 科长应桂馨

外务科 科长沈翔云

交通科 科长李 愍

书记长 邬 珍

军务部: 部长钮永建、副长李显谟

军事科 科长潘组培

人事科 科长高一谋

军械科 科长张 群

军需科 科长张兆釜

执法科 科长蔡 寅

训练科 科长凌敏刚

总务科 科长朱葆康

书记长 徐和笙

外交总长	伍廷芳	
民政部长	李平书	
	市政厅长	莫锡纶
	警察厅长	穆抒斋
	县民政长	吴 馨
	县司法长	黄庆澜
	闸北民政长	虞洽卿
财政部长	沈缙云	
交通部长	王一亭	
海军部长	毛仲芳	

上列各部正、副部长,除伍廷芳系社会名流,李平书系绅商暨商团领袖,毛仲芳系海军起义将领,盛典型身份待查外,其余均为同盟会会员。

在沪军都督府中,民政部长李平书拥有相当大的权力,陈其美说:“保卫地方一切事宜,划归民政总长李办理。本都督得一意编练军队,筹划征讨大计。此后各属凡关于地方绥靖事宜,着向民政处报告,听候民政总长李办理,以清界限,而靖地方。”^[51]凡一切内政,“均责成民政部长”^[52]。李平书拥有的权力和地位,早在上海起义前便已确定。为了争取地方绅商势力的支持,陈其美、李平书初次见面,便达成“宜专以地方自治为重”,“彼此随时协商,互相尊重主义,避免侵犯”的原则^[53]。除李平书外,沈缙云、朱葆三、王一亭、叶惠钧、虞洽卿等人既是同盟会会员,又是上海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具有双重身份,实际上他们更以后一种身份为主。在沪军都督府中,地方绅商势力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在当时各地新政权中是极少见的,也是上海光复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同上海工商阶层力量相对雄厚且对革命贡献巨大直接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沪军都督府又是革命党人与上海地方工商势力相结合的资产阶级革命联合政府。